

# 海南文物安全工作提升对策研究

周治平

海南坐拥丰富且独具地域特色的文物资源，在自贸港建设全面推进的背景下，文物保护利用迎来新机遇，同时也面临风险类型多元、资金保障不足、基层力量薄弱、监管统筹不够等现实挑战。本文立足海南文物安全工作实际，聚焦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核心，梳理工作基础，剖析痛点短板，融合外省成熟经验，探索符合海南特点的文物安全提升路径，为全省文物保护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 海南文物安全工作基础与前期成果

海南始终将文物安全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底线工程，以系统性保护、全链条监管、常态化防控为主线，在制度建设、资源管控、设施升级、重点防护、执法监管、市场化保障、科技人才支撑等方面持续发力，文物安全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十四五”以来全省文物安全工作基础持续夯实，保障体系日趋健全，防控能力显著提升，重点文物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为应对自贸港建设带来的各类风险挑战、推进文物安全系统性监管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十五五”时期健全统一监管体系、创新保险服务模式、提升系统性保护水平积累了实践经验、提供了有力支撑。

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安全责任全面压实。海南率先颁布实施《海南省文物保护条例》，出台《海南省文物安全管理责任制实施办法》，构建分级负责、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单位主责的责任链条，将安全责任压实到岗、细化到人。全面推行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制度，公开责任主体与监督渠道，接受社会监督。严格执行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将日常巡查、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常态化管理体系。推进省级以上文保单位“四有”工作全覆盖，完成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划定、标志碑设立、档案规范化管理，为依法监管提供坚实依据。

资源底数全面摸清，精准管理基础夯实。高质量完成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收尾，系统梳理全省不可移动文物分布、保存状况、风险等级与管理主体，建立动态管理平台。完成可移动文物普查登记、定级建档与备案管理。针对水下文物、革命文物、南洋文化、历史聚落开展专项排查，建立特色文物资源风险清单，实现从“全覆盖监管”向“精准化防控”转变。

安全设施提档升级，全域防控能力增强。实施安防、消防、防雷“三防”设施提升行动，重点推进省级以上文保单位安全防护设施升级改造，防护水平显著提升。推广文物卫星遥感监测，实现非法扰动快速发现、精准处置。建立线上预警与线下巡查结合机制，严厉打击各类文物违法行为，有效遏制重大安全事故。

重点领域保护见效，关键对象安全稳固。水下文物保护取得历史性突破，完成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考古调查与发掘，布设水下永久测绘基点，印发南海海域水下文物安全保护工作方案，实施水下文物保护单位常态化管护。革命文物片区化保护成效突出，完成225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269件/套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公布，推进琼崖革命旧址修缮、安防升级与红色标语文物专项保护，红色遗产安全状况显著改善。考古遗址保护持续加强，三亚落笔洞遗址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南或河遗址新发现旧石器旷野遗址群。南洋文化、东坡文化、黎族传统聚落相关文物保护有序推进，重点文物保护安全底线筑牢。

保障机制逐步完善，支撑能力持续强化。省级财政持续加大文物安全投入，重点支持设施建设、隐患整改、巡查管护与执法监管。省文旅厅加挂海南省文物局牌子，增设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扩充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海南管理处力量，成立省文物鉴定委员会，构建“行政监管+专业研究+鉴定服务”格局。探索推行文物保护员制度，充实基层管护力量，打通监管“最后一公里”。文物保险市场化保障破题起步，临高县落地全省首单，探索“保险+服务”模式，为风险前置防控、损失快速补偿积累实践经验。社会参与渠道不断拓宽，初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保护格局。

## 海南文物保护痛点分析

当前，全国文物安全系统性保护与统一监管体系加快完善，各地均将文物安全纳入政府年度考核，专门监管机构数量持续增加。相比之下，海南文物安全工作与自贸港建设新形势下的保护要求之间仍存在差距。

风险多元分散，统一防控难度大。海南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高温、高温、强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频繁，各类文物损毁风险高。木质结构的古建筑易受白蚁侵蚀、潮湿霉变，砖石结构文物面临风化、雨水冲刷。海南周边海域广阔，水下文物丰富，但水下环境复杂，文物面临被盗窃、海洋生物侵蚀、船只航行破坏等风险，跨区域、跨领域统一监管缺位。伴随自贸港建设推进，各类建设项目增多，各类风险点多面广，施工扰动对地下文物的破坏风险持续上升。

监管体系碎片化，统筹保障不足。文物安全监管涉及文旅、应急、消防、海洋、住建等多个部门，统筹协调不足、联动执法不畅，统一监管效能难以发挥；基层管护力量薄弱，未定级文物、非国有文物长期处于监管覆盖盲区，保护责任悬空、风险隐患突出。文物修缮养护、安防消防升级、监测预警建设等均需持续稳定投入，尽管省级财政给予保

障，但与实际保护需求仍存在较大缺口。大量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非国有文物缺乏常态化资金支持，普遍存在保护缺位、失修老化等问题。同时，社会资本参与渠道不畅通、激励机制不健全，资金来源过度依赖财政投入，多方参与、多元筹措、统一统筹的资金保障机制尚未建立。

“文物保险+服务”起步较晚，系统支撑不足。文物保护工作涉及考古、历史、建筑、修复、安全监测等多领域专业。海南在文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引进、留存方面相对滞后，文物安全监测、预警、防控的科技化水平不高；文物保险等保障模式起步晚、覆盖面小，未能与统一监管深度融合，风险前置防控、多元保障能力薄弱。

## 海南文物安全系统性监管提升对策

健全统一监管体系，压实全域安全责任。积极推动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优化职能配置，增设全省文物安全监测技术服务部门，强化技术支撑与统筹协调。推动制定文物保护长、文物保护员相关制度，压实基层一线管护责任，打通文物安全监管“最后一公里”。持续落实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制度及《海南省文物安全管理责任制实施办法》，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文物安全工作格局。

创新文物保险模式，嵌入统一监管流程。积极借鉴福建“文物保险+服务”、北京“分类监管+精准保险”经验，将保险机制全面融入系统性监管。出台文物保险扶持政策，对投保文物的单位或个人给予一定保费补贴，提高社会参与文物保险积极性；对开展文物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在税收优惠、风险补偿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降低保险公司经营风险，鼓励其开发更多优质文物保险产品。鼓励文物保护单位在进行修缮、维护等工作时，优先考虑投保文物保险，保障文物安全。全面借鉴福建“保险+服务”模式，支持保险机构结合海南文物特点，开发多元化产品，推动保险公司将保险前置服务纳入统一监管流程，实现“事前统一防控、事中统一处置、事后统一赔付”。全省统一复制推广，以临高县文物保险首单试点、海口、三亚、琼海、定安等市县可加快复制推广，以点带面形成全省示范效应。

夯实统一保障基础，提升监管整体效能。建立财政资金、保险保障、社会资本、公益捐赠相结合的多元投入机制，重点支持基层文保单位、未定级文物、非国有文物保护。加大文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与引进力度，完善基层文保人员培训、激励机制，提升巡查、监测、修复等专业能力，为文物安全统一监管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推动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与监管流程深度融合，提升文物安全监测、预警、防控智能化水平，为系统性监管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单位：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 从「黑石号」到「新丝路」：长沙窑工艺复兴与湘品出海路径探索

李冠华

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国家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背景下，海上丝绸之路保护与联合申遗工作有序开展。依据《“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海丝申遗既是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也是展现中华文明特质的重要窗口。长沙铜官窑作为湖南唯一纳入海丝申遗“陶瓷摇篮与廊道”核心主题的史迹点，深挖其历史价值、推动工艺复兴，是助力湖南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有力实践。长沙铜官窑坐落于长沙市望城区铜官片区，窑业兴盛于唐五代，是古代知名民间瓷窑，学术界称其为长沙窑。其烧制技艺201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遗址公园2013年获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集考古遗址、非遗技艺、文博资源、地域文化符号于一身的复合属性，让长沙窑具备了技艺活化、产业培育与国际传播的坚实基础。

## 历史回眸：长沙窑的文化价值与历史地位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长沙窑是唐代工艺创新的标杆。业界长期认为其首创釉下多彩，打破了唐代“南青北白”的陶瓷格局。结合近年研究成果，长沙窑经典彩饰工艺实为一次烧成的高温彩装饰，与传统釉下彩存在工艺区别。勇于突破、持续创新是长沙窑与生俱来的基因，也为打造当代特色“湘瓷”品牌提供了深厚历史借鉴。

在文明交流层面，长沙窑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互鉴的鲜活物证。器物表面的诗文题记、民间警句、印花贴花等装饰，生动还原了唐代民间生活风貌与审美取向。作为外销瓷窑，长沙窑大胆吸纳域外元素，椰枣纹、胡人形象等纹样，形成中西交融的艺术风格。“黑石号”沉船出水数万件文物，其中主体即为长沙窑瓷器，印证了其在唐代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2024年，为纪念中法建交60周年，长沙博物馆4件唐代长沙窑文物赴法展出，再度向世界展示千年瓷韵。馆内同期展出的“我有方寸心——唐长沙窑瓷器诗文特展”，集结13家文博单位、183件/套展品，全方位呈现诗词、书画与陶瓷工艺相融的艺术特色。

2026年，湖南省第六届旅游发展大会（永州专场）以永州为题材，举办“千年遗唱——长沙窑诗文里的唐代社会生活”特展。展览以解析瓷器上的题诗为切入点，从“焰红湘浦、乐府新声、万里商路、风飘绮罗、人间万象”五个方面，系统展示长沙窑作为唐代中晚期三大著名外销瓷之一，在促进唐代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中外文化、商贸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说，长沙窑既是解读湖湘文化的重要实物，也是见证唐代中外经贸、文化往来的核心载体。

从古代产业视角来看，长沙窑是民间产业参与全球化贸易的典范。其产品远销亚非20余个国家和地区，依托江河水系构建起连通海内外的贸易网络。诸多器型、纹样专为海外市场定制，彰显出成熟的商品思维与国际化视野。长沙窑的成功，不仅依托精湛工艺，更在于立足市场需求灵活创新。这套发展逻辑穿越千年，至今仍可为“湘品出海”提供宝贵经验。

## 现状审视：复兴机遇与挑战

当前，多重政策与产业利好，为长沙窑保护传承、活化利用开辟了广阔空间。国家持续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健全传承梯队，推动传统技艺与现代教育融合，同时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鼓励文旅融合、创意设计等特色品牌培育。湖南省立足发展布局，推动文旅深度融合，重点扶持“湘绣、湘茶、湘瓷”等特色文旅商品，引导“湘字号”文化产品走向国际。依托良好政策环境，湖南文化产业生态不断优化，新业态、新场景持续涌现，为长沙窑从单一文物保护项目转向综合性文化产业项目，嵌入现代产业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多年发展，长沙窑已形成一定的展示传播和创新探索基础。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常态化开展展览、研学、体验活动，依托长沙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平台优势，非遗与文创产品出海渠道持续拓宽。与此同时，青年传承人已开始尝试从

传统器物向实用器、IP产品、线上销售延伸，如“青绿彩”茶具、“才华横溢”系列杯具和“嘟嘟长沙兽”等产品，都体现出从文物元素中提炼现代设计语言的努力。这说明，长沙窑并非没有创新，而是已经进入由“技艺传承”向“产业化表达”过渡的关键阶段。

机遇之下，现实挑战同样突出。其一，技艺传承难度高。公开报道显示，制作一件铜官窑陶瓷至少需要6种原材料配比、10多道工序、原材多到周期，且窑火、泥料和开窑环节高度依赖经验判断，这决定了该技艺难以用一般工业逻辑快速复制。其二，产品创新较为零散。目前创作多以个体工作室、独立匠人自主研发为主，缺乏系统化研发体系，文博资源向现代生活用品、潮流文创的转化力度不足。其三，出海配套能力薄弱。当下跨境贸易已转向品牌化、合规化、本地化运营，而长沙窑相关产品在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认证、海外运营、跨境服务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简言之，长沙窑当下的核心难题，是如何将传统手工艺转化为具备市场竞争力与国际传播力的成熟产业。

## 融合路径：传统工艺复兴赋能“湘品出海”

产品布局上，搭建分层分类的“金字塔”体系。塔尖为高端收藏品类，以大师原创作品、古瓷复刻、高端定制器物为主，完整还原传统技艺，彰显艺术与学术价值，树立品牌标杆。塔腰主打生活美学产品，联合设计师打造联名款茶器、花器、艺术摆件、商务礼品，以现代审美重构传统器型与纹样，拓展主流消费市场。塔基面向大众消费，开发日用陶瓷、文创饰品、文具、IP衍生品等，降低消费门槛，扩大品牌受众。分层体系既适配传统瓷艺生活化转型趋势，也契合跨境电商品牌化发展方向。

发展模式上，实行“文化+”与“产业+”双轮驱动。一是深耕文化+旅游，整合遗址公园、博物馆、古街、非遗工坊资源，打造集游览、研学、体验、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场景，完整展示长沙窑技艺与产业脉络。二是发力文化+科技，搭建长沙窑器型、纹样、色彩数字资源库，运用三维展示、虚拟交互等技术，实现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创意应用，探索个性化定制服务。三是推进产业+教育，联动传承人、院校与市场主体共建实训基地，推行产业导师制度，定向培育技艺、设计、运营复合型人才。四是强化产业+平台，依托国家文化出口基地、跨境电商展会、线上出海平台，构建“研发—展示—交易—服务”全链条闭环。整套路径完全契合非遗保护、文旅融合、数字电商等国家政策导向。

国际传播上，构建适配海外市场的文化叙事体系。长沙窑最有价值的表达，不是单纯强调“古老”，而是突出其“曾经就是全球化商品”的历史身份。核心叙事可凝练为：长沙窑并非被动走向世界，而是早在唐代就以成熟市场意识、跨文化设计能力与规模化生产体系，主动融入世界贸易网络；今日复兴，是在新技术、新渠道条件下，重启这种面向世界的文化创造力。围绕这一主线，重点讲好三类故事：一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长沙造”，突出其外销瓷身份；二是“从椰枣纹到现代设计”，突出其跨文化译码能力；三是“从诗文壶到生活器”，突出其从审美器物向生活美学的延续。此类叙事既有坚实考古与文献支撑，又契合海外消费者对文化深度、手工温度、审美独特性的价值追求，更易形成情感认同与品牌共鸣。

总之，长沙窑最值得重估之处，在于它并非单纯“古老”，而是兼具原创工艺、市场意识、海丝基因和跨文化表达能力的历史产业样本。推动其当代复兴，不仅是保护一门技艺、开发一个景区、打造一批文创，更是将湖湘文化中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向海而兴的精神内核，转化为新时代“湘品出海”的特色赛道与核心竞争力。坚持保护优先、创新转化、品牌引领、系统推进，长沙窑完全有望从“历史名窑”成长为当代湘瓷出海的战略支点，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文明交流互鉴贡献新的“湖南力量”。

(作者单位：长沙市博物馆)

# 编织生命之网

## ——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文化属性

燕海鸣

伴随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和学术研究的进展，“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文化属性不断显现。在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和国际传播等实践中，这一概念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日益提升。但与此同时，围绕其内涵的学术争议也始终存在，如沈丹森(Tansen Sen)借用霍布斯鲍姆“被发明的传统”(invented tradition)一词，将海上丝绸之路及其话语体系视作一种缺乏历史根基、专为现代政治目标服务的“发明”。笔者认为，应关注和客观认识此类批评，并在学理层面与之进行对话。本文尝试以人类学者英格尔德的“交织网络”术语阐释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在文化维度的契合性。

## 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源流与当代发展

首先应认识到，任何学术概念都有其诞生及其流变的过程。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建构”甚至“发明”的。一个概念具有现代建构性，并不能否定它所指涉的历史内涵。将一种社会知识简单归为建构的产物，会遮蔽其演变过程的复杂性，更无法获得智识上的突破。指出“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建构性，只是认识到该术语与当代政治文化有较强关联的一面，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其历史性与内在价值，学术工作不应止步于此，而应去探寻概念背后所呈现的关于古代海洋世界的图景。

古代东亚、东南亚、南亚、阿拉伯世界与东非之间长期存在的航海往来、贸易流通过证的历史互动，是由多文献、考古发现与文物遗存印证的历史事实。以“海上丝绸之路”来指代这一历史事实，也具有清晰的发展脉络，其源头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20世纪中期以来，东亚学者逐步将这一陆路概念延展至海洋空间，至20世纪80年代，海上丝绸之路在学界已形成相对稳定的表述。

如今该概念在国际层面的接受与扩散，已经超出了单一文化或语言体系的范畴。在Google Scholar等数据库中，以“Maritime Silk Road”为关键词的学术条目已达数万条，更产生了以“海上丝绸之路”为标题的一系列代表性著作。比如德国学者若德里希·普塔克所著《全面回顾15世纪前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海网络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米歇尔·雅克—埃尔古阿尔克的《马来半岛：海上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拉尔夫·考茨主编的《海上丝绸之路诸面向：从波斯湾到东海》和弗朗克·比耶等人主编的《海上丝绸之路：全球连接、区域节点与地方性》等。学术研究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整体研究”专门将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丝绸之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这一概念推向了全球遗产保护与跨文化对话的国际舞台。可见，“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长期学术积累，已成为一个具有跨学科传播能力的

关键词。

与“海上丝绸之路”并行发展的，是另外几个指涉古代海洋世界的概念——如香料之路(Spice Route)、季风航路(Monsoon Route)以及印度洋世界(Indian Ocean World)。不同概念揭示的是古代海洋世界的不同侧面，以及当代使用者的历史观。“印度洋世界”凸显的是一种地理空间；“季风航路”有一定的古典意涵，可引申至古罗马时期航海技术的突破；“香料之路”则突出核心贸易品的地位。每一个概念都有其特定价值，对我们理解古代海洋世界体系均有助益。

一些学者尝试论证个别概念比海上丝绸之路更优，更适用于学术语境。实际上，概念本身不存在孰优孰劣，任何宏观历史地理维度的命名，都是后人为了综合繁杂史料而进行的追溯性建构。“香料”“季风”“印度洋”，同样是带有特定视角的概括性提炼。不应有选择地质疑某个概念的“建构性”，却对其他概念同样作为建构结果的事实避而不谈。

## 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文化属性

一个概念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其是否“纯粹”，而取决于其是否能够组织经验、连接材料并产生解释力。“海上丝绸之路”有其自身的特点或优势，其对复杂历史的综合解释力，对古代海洋世界所呈现的丰富文化和情感细节的呈现力，为我们理解并想象宏大历史叙事和微观生命经历提供了更好的画面感。

英国人类学家蒂姆·英格尔德(Tim Ingold)从生态人类学角度提出“交织网络”(meshwork)概念，认为世界是由无数生命轨迹在沿途行进中交织的“线之网”。从这个角度理解古代海洋世界，可以认为这是一组由海上的行动实践所构建起来的“海洋网络”(Maritime Network)。在许多不同指向概念之外，“海洋网络”可以充分体现这一组“线之网”的画面感，呈现出无数海洋栖居者通过航海、贸易和互动而交错编织成的生命景观。

在诸多描述古代海洋网络的概念中，“海上丝绸之路”又是最贴近英格尔德所说的“交织网络”，把自然之线、贸易之线与行动之线整合在同一叙述中，使宏观网络被还原为具体路径与实践轨迹。它更有能力在微观层面穿透历史，将航海行动者、货物贸易活动、自然条件等多主体纳入统一视野。海、丝、路，这三个字眼构成的概念集合，契合了英格尔德关于“交织”的理解，“海”代表了变幻莫测的生态媒介，照着存在水手、渔民等海洋栖居者与风浪博弈的真实生存体验与身体感知；“丝”作为高度凝练的物化媒介，代表了跨洋流动的物质文化，照着工匠、商贾以及他们在沿途交织的技艺与商品交换；“路”是无数生命主体在真实沿途



中一艘大船的再现图  
阿拉伯古文文献《哈里里故事集》



明代东西洋航海图

行进中延展出的动态轨迹。

同时，“交织”这一具有活力感的动词，赋予了海上丝绸之路突出的文化属性。丝绸的特质与交织这一动词结合，一条条被不断穿插起来的线，将不同地区、不同人群连接起来。与香料、季风等更具功能性或自然属性的概念不同，丝绸不仅是商品，更是一种高度文化内蕴的物质——它关联手工艺、审美传统、身份象征与礼仪体系，同时在跨文化传播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丝绸承载着柔性、连接与交流的象征性内涵，使这一术语在表达历史联系时，具有文化与情感的双重维度。

因此，当我们理解古代海洋世界的行动体系，揭示跨区域联系、分析港口网络与文化互动，并阐释留存至今的文化遗产时，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它将宏大的空间系统还原为具体世界，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全球海洋交往的历史。回应海上丝绸之路概念是一种“发明”的批评：如果能够产生极具学术生命力和知识创造力的概念，能够支持人类社会更全面客观认识古代海洋世界，那么这样的“发明”可以越多越好。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专项(2024年度)——世界文化大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经验借鉴研究课题(24VWB032)成果。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我有方寸心——唐长沙窑瓷器诗文特展